

心民族的 怀抱 嘱托

陆捷非

| —— 国家重点学科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暑期贵州社会实践实录 |

那方水土那方人，将伴随我一生

未曾走过的路

一个老外的发现之旅

我和安龙孩子们的世界

尚未寄出的信

.....

心·民族的 嘱托

—— 国家重点学科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暑期贵州社会实践实录

荣誉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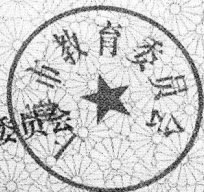
上海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生暑期贵州田野考察团队

荣获2010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项目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怀民族的嘱托 / 孙景尧主编.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81126-225-4

I. ①心… II. ①孙… III. ①民族地区—社会调查—调查报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3128号

心怀民族的 嘱托

——国家重点学科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暑期贵州社会实践实录

责任编辑: 立 道 周 清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佳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9 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225-4

定 价: 39.7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6573626

主编

孙景尧

参编

段周薇 饶 静 邵文苑 汪太伟 张书圣



心怀民族的嘱托与希望 做新时代的学人

孙景尧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由20位同学自写、自编的书。这些同学，有的是硕士研究生，有的是博士研究生；有的做过教师，有的是从家门到校门并从未跨入社会的学生；有的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和澳门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的来自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四川、河南等不同省份，还有的来自美国、法国等不同国度。尽管如此，但他们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时，却有三点都是共同的：学的都是比较文学专业，缺的都是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少的都是社会实践的历练。



自2005年起，我们就安排同学们利用暑期，一道前往贵州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安龙山区做社会实践和田野调查，并将之作为入学的第一课。如今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尽管他们分属各届，但他们所获得的内心体会和心灵启迪，则是课堂教学所无法企及的。尤其读到他们所写的真情实感的文字，使已过花甲的我也不禁为之动容。

第一批去做英文支教的博士生陆辛、曾新和邓艳艳，他们如今分别在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校任教，陆辛在《安龙

琐记》中写道：“我们向他们——安龙一中的同学和老师，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们以少数民族山里人的质朴和执着，送我们直到安龙县界，拥抱、流泪，久久，久久才分手离去……。第二年的暑假，他们欣喜地告诉我们，尽管他们高考的试卷换成全国乙类地区卷了，但他们全校英语平均分却上升了。对此我们反倒流下了说不明的眼泪，道不尽的思念与希望……”

2006年暑期去支教，而现在上海南模中学任教的王捷，在她时隔三年后写的《苦辣酸甜安龙行》一文中说：“安龙生活的‘苦闷’，学生好学的‘辣劲’，我们为安龙学生而感到的‘辛酸’，与离别时内心感动后的‘甘甜’，汇聚交织在一起。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离开安龙已经有三年了。记忆中的很多笑容与声音已经有些模糊不清。魂牵梦绕中，只记得那里的天很蓝，山很高，学生的笑容很灿烂。如果有机会，我还想重回那个地方，感谢那里的学生，他们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感谢那里的老师，他们对我们从住宿、饮食到课余闲暇时间，对我们细心照顾，帮助我们适应安龙的生活。也感谢上师大的老师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锻炼的好机会。”

如今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深造的上海姑娘贾君卿，是从未下过乡、也从不缺少父母宠爱的学生，面对那些父母外出打工、自己独自生活的孩子，她是这样抒写一则铭记她心头的支教体会的：“事实上，安龙的孩子心理上特别成熟懂事，非常敏感。你一个小小的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这些孩子深深地知道自己离大学校门很远，也知道自己这条路会走得异常艰辛，但他们不想让家人失望，不想让别人看不起。班里的一个男孩子生病没来上课，次日我见到他的时候，就问了一句：‘好些了吗？吃过药了没？’没想到这平日一直笑嘻嘻的布依族男孩子竟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解释自己的眼泪：‘没有药……太贵了……也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我心都碎了，搂着他的肩膀想说些安慰的话，突然发现这孩子那么瘦，那么脆弱，他颤动着的肩膀让我永远

忘不了。”

如果说，美国硕士生罗静，她对“什么是贫困？”作了如下的反思：“我对所谓的贵州‘贫困’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能体察出中国各个地区发展中那些细微的差距。在我看来，贵州省的城市，与中国其他的城市类似；贵州省的农村，与中国其他的农村类似。然而，随后的两件事颠覆了这个想法。一个是参观手工造纸作坊，另一个是参加安龙一中的学生座谈。我深深地体会到‘贫困’绝不限于物质方面的匮乏，而物质的缺乏也不一定等于‘贫困’。更重要的是，我之前对‘贫困’的理解，充其量，只来源于我生活了大半生的美国南部，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那么，法国博士生尼古拉则对如何摆脱“贫困”，既表达了他的担忧，又提出了他的建议：“如果政府只是投资提高工业和旅游行业等的硬件水准，不一定能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好处，却很有可能对这儿的和谐，包括民族文化和和谐，尤其是如此美好的生态和谐等带来威胁。而更应重视的是发展教育，比方，增加贵州学校的师资力量，提高学生的高考水平，使学生能在大学获得专业学习。如果贵州能拥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会带来两个良好的后果：第一，会有更多的工程师，更多的文化学者和更多信息论专家等可以投入贵州的发展；第二，会有更多更好的老师，培养更多更好的毕业生，提高当地的文化科学水准，这样就能产生良性循环。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使我们看到社会的改变对传统民族的影响：一种可能是，有些民族常常和社会一起变化，对民族传统渐渐遗忘，导致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慢慢消失。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是，以发展现代化的方式保护文化。我希望贵州人民能够选择后一种方式，这样这一地区的居民和文化都可以被保存下来，同时他们也可以过上更加安逸与和谐的生活。”

这些出自年青学子心声的文字，正如他们自己编排此书的归类标题所示，既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课”，又是“那方水土那方人，将伴随我一生”。事实上，今天他们仍然同那方水土那方人，在继续着“两地书，一

心怀民族的嘱托

样情”。我真诚地希望，他们永远心怀民族的嘱托和希望，敬业好学、精进不已，做一个服务社会、回报民族的学人。

我愿与之共勉。

2011年5月 于沪上

序言

心怀民族的嘱托与希望做新时代的学人 /孙景尧/ 1

那方水土那方人，将伴随我一生

学术的传承与心灵的旅行 /汪太伟/ 2

穿越历史的沧桑 /许 心/ 15

此情此景：山水布依 /袁尚伟/ 21

黔西南考察掠影 /段周薇/ 26

人与自然的和谐 /周圣来/ 35

学行述怀 /张书圣/ 43

我和贵州的距离 /许晓艳/ 47

未曾走过的路 /王自亮/ 54

心灵的旅程 /程培英/ 59

敢问路在何方？ /赵 菡/ 65

What Is Poverty? 罗 静/ 70

一个老外的发现之旅 /尼古拉/ 85

我生命中重要的一课

安龙琐记 /陆 辛/ 92

苦辣酸甜安龙行 /王 婕/ 120

我和安龙孩子们的世界 /贾君卿/ 127

记忆与收获 /苗 青/ 133

触动与敬佩：我的一个心愿 /邵文苑/ 143

两地书 一样情

如星月、如喜雨、如清风、如莺歌 /段周薇/ 156

爱心在传递 / 169

百色市田阳县玉凤中心校小学生日记选 / 173

孩子们，你们都是向日葵 /杨 旻/ 198

尚未寄出的信…… /姚连兵/ 201

学苑撷英

On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Action in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Sun

Jingyao and Deng Yanyan/ 216

庞天寿小议 /孙 琪/ 236

那方水土那方人，
将伴随我一生



学术的传承与心灵的旅行

汪太伟^[1]

田野实践方法之缘起与知识分子眼光之向下



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在其学习阶段，都会面临如何做学问的问题。虽然前辈学者学术研究路径因人而异，但学术上有杰出成就者所用之方法却常为后学者所效法，二者之间建构起一种继承和超越的关系。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提出纸上之材料要与地下之材料相结合，实际上就是强调

[1]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实证，主张摆脱传统经史之学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及其上的古文字资料，并能有机结合这两方面的材料来治史，以地下古文字材料补证文献史料。照王国维所说，地面的文字资料如果可以和地下出土材料相印证的话，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就能经得起推敲。至于“二重证据法”特定而丰富的内涵，王国维说出了其中的一个层面，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的互证。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二重证据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的考证方法，根本就在于二重证据是不同角度的实学互证。

在运用“二重证据法”时，学者们是非费艰辛不能够取得成果的，有时甚至得靠一定的学术缘分。当有些研究尚未取得地下相关材料佐证坐实的时候，绝不可妄下结论，否则结论就可能挂一漏万，甚至会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胡适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固然不可谓不可，但求证却至关重要，求证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环节。在图文资料电子化时代，对一般学者而言，大可以安坐于家，利用一切网络资源，窃喜似乎可以穷尽一切所需之研究资料。事实上，网络虽然为资料查询带来了很多便利，其所蕴含的信息量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若一味地依赖网络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恐怕也未必能够获得充分的材料。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得以跟随我的导师，是我一生的学术缘分。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比较文学研究三原则，即“理论研究、文本细读、田野考证”，则成为我思考和研究问题时的出发点。在中外文学与

文化关系研究领域，先生以研究天主教入华最为擅长，他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十分推崇，并以陈寅恪的阐释作为参照。虽然“二重证据法”是一种治史方法，但是先生却将其为我所用，并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地检验着这种方法的实效性。先生据此认为，要获得有效的研究成果，就必须认识到比较文学理论是学科存在的必要基础，所以一定要了解和熟悉本学科的理论建构及其历史演变，同时也要注重文本细读，只有读懂了文本（尤其是那些涉及学科理论知识的著作以及有关哲学、宗教等社会科学的古代文学文本），才能对文本信息进行准确的归类选择，为进一步专题研究奠定基础，而最后的结论还有赖于田野考查的印证。因此“理论研究、文本细读、田野考证”的三原则，不仅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

从2006年起，先生专门设置了一个暑期田野作业的教学环节，这一环节的设置，把中国华东地区经济文化发达的上海和西南地区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安龙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教学活动，不仅是师者对于学生的一种“传道、授业、解惑”，更是一次让学生们深刻了解国情的爱国主义教育。

先生任职的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的重点大学。上海这个经济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似乎与乡土中国沾不上边，在师大求学的大部分学子，在与国际化接轨的喧嚣声中，都习惯于眼光向外。学好外语，出国留学，成为都市校园学子追求的时尚。无论是为生存计，还是为发展计，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发展同乡土中国联系在一起，乡土中国一度成为被都市学子遗忘或忽略的角落。先生通过暑期田野作业的教学活动，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既为师生间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承搭建了学术平台，又为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表达提供了精神家园。先生时常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读硕士、博士，不要做精神的贵族，要眼光向下。”因此，我们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从象牙塔走进了西南偏远之地，与小县城的历史文化与普通民众接触，则是我们“眼光向下”的一个重要环节。先生所殷切希望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教学实践活动，使我们大家从中获

益，使“眼光向下”成为我们以后学术生涯中的一种自觉。

2009年的7月暑期，按照教学实践环节的计划，先生所招收的2008、2009两个年级的研究生分别从上海、澳门、美国等地奔赴贵州安龙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与实践学习。这一次的田野教学，先生不仅给我们传授了具体而生动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更让我们经历了一次感动乡土中国的心灵之旅。

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传授

我们的目的地安龙县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南部地区，地处黔、滇、桂三省结合部，就地理位置而言，在贵州也算是偏远的了。作为贵州人，我去安龙之前对其所知甚少。在从省会贵阳市前往安龙县的行程中，先生就开始对我们介绍起了安龙。他走进安龙，得缘于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2003年受贵州高师培训中心的邀请，为安龙的中小学校长做培训讲学（这是联合国对贫困地区的培训项目之一）。当时先生从上海经贵阳再到安龙，贵州曲折的山路，使先生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车程，他常对我们谑称那时的情况：“贵州人民欢迎你，贵州公路抖死你”。也许在莽莽群山之间，在颠簸的汽车上，先生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安龙结下不解之缘。到达安龙不久，他在那里有了意外的发现，之后他不仅为了研究的需要经常前往安龙，甚至还把安龙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教学点。

先生的发现是在一次课歇时间获得的。课间休息时，他透过窗户打望安龙县城的一角，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望，发现了小县城的奇特之处：在距离讲学校舍不远的地方露出教堂的一角，对天主教颇有研究的先生一眼看出那是一座天主教堂，顿时他满心欢喜。待到课务一结束，先生就兴冲冲直奔该教堂而去，当他拾阶逐步走进这座教堂的时候，先生的惊奇更甚。自入门开始，典型的欧式教堂建筑风格就映入眼帘，天主教堂保存得非常

完好，使先生产生了一种置身于欧洲小镇的错觉。走过曲曲折折的教堂甬道，先生来到了教堂的腹地，发现那里居然陈列着不少出土的石碑雕刻，那些石碑雕刻上有凯尔文和拉丁文字，还有显著的十字架标志，使其更显珍贵。先生意识到了这些资料的研究价值，他立即把这些发现用相机拍摄下来，并在笔记本上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了仔细临摹，以备将来查证。经过反复多次的考证，先生发现了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在这些石碑雕刻上有确凿记载，又经过对《南明实录》等古籍资料的查证，在“纸上资料”与“地下出土材料”二者之间进行比较互证之后，对《南明实录》等对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关系的有意忽略提出了质疑。在对南明永历王朝风雨飘摇命运的理解上，先生也通过这些碑文资料敏锐地察觉到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其中的影响因素。这一次发现，使先生认识到：田野作业所获得的发现，是在书斋里难以获得的。先生对安龙天主教和南明永历王朝关系的阐释，凸显出了安龙历史文化与异质文化接触的历史特征，不仅为理解南明王朝的风雨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并成为理解黔西南安龙、贞丰等地布依族少数民族村寨天主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参考。

在安龙天主教教堂这个教学实践点中，教堂的碑文石刻都成为了先生重要的教学素材。当我们随同先生进入教堂时，他就开始了详细的讲解，并且邀请教堂神父当我们的特殊讲解员。在神父的导引下，我们大致了解了整个教堂的布局，每到一处，神父都会为我们做些介绍，而先生则会把自己考证中发现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来进行详细分析，引导大家积极地思考，并鼓励我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教学活动中，我们获知了先生提炼问题的方式，由此获得了学术思维的训练。先生的现场教学，尤其注重实践性。这座教堂所陈列的碑文石刻，不仅具有宗教传播史的考证价值，而且是考证南明永历王朝兴衰的一个重要参照。先生对这些碑文石刻十分重视，并且对其内容进行过认真的考证。通过这样的教学实践活动，他意欲教导学生，应该如何发现出土文物的价值，应该运用何种方法去鉴定这些出土文物的历史时效性。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带给我们一种

漫游在历史文化时空的快乐，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了思考相关历史人物事件关系的理趣。

此外，在理解南明永历王朝历史文化背景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明代中叶，葡萄牙人便在澳门修建礼拜堂，将天主教传到广东。永历帝在肇庆称帝后，耶稣会派传教士毕方济、瞿纱微等来到肇庆，积极支持永历王朝，企图在东方建立天主教国家。永历政权也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恢复半壁江山，于是主动向耶稣会靠拢。在永历政权退守桂林的时候，毕方济前往澳门求救，葡萄牙澳门当局派遣300多名士兵助守桂林，还

